

政协提案助推取消农业税

农业税是我国对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个重要税种，在我国改革进程中留下了一笔。2006年1月1日起，农业税全面取消，意味着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皇粮国税”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回顾取消农业税的历程，一直不乏关心关注为农民减负的各级政协委员们的身影。他们在不同历史时空，共

同汇聚成为助推取消农业税的力量之一，充分体现了政协委员履行参政议政使命的责任感和热情。

取消农业税呼声高涨



我国上世纪农民交“公粮”场景。

农业税，是中国历史流传千年的“皇粮国税”传统。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6月3日，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自此，农业税成为我国对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个重要税种。

农业税的特征非常明显：以农业收入为征税对象；以常年产量为计税依据；实行实物和货币两种方式征收；实行由国家统一控制下的地区差别比例税率；地方政府具有相对较多的管理自主权。由农业税自身的特点决定，该税设立后，在很多地方多以实物形式征收，也就是让农民交粮食或者主要农作物，而不是交钱，征收时多由乡村干部实施。所以在民间，该税又被俗称为“公粮”。

“农业税在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起到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一位专家解释说，“农业税主要应用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农村事务，这对一个农业大国特别是当时财政状况极度虚弱的中国来说，具有积极作用。”毋庸置疑，农业税曾经在特殊年代，为中国的阶段性发展赢得了空间，中国亿万农民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当时的农村税制，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下设立的，城市与农村的税制两线并行。而这种两线并行的税制结构，对中国农民形成了不公平的税收负担。

正是注意到了农业税的种种弊端，在农业税实施了40余年后，社会上要求减少乃至取消农业税的呼声开始逐步出现，那时候农民还是这一声音的主要来源。到2000年左右，一些地方官员和经济学家也开始重视这个问题，这其中也包括许坤元、郑祖康在内的各级政协委员。

提出《关于免征农业税的提案》

此时取消农业税的时机是否成熟？社会各界人士对这一问题上下求索，从不同角度给出了不同回答。

许坤元、郑祖康在提出取消农业税的提案之前，进行了深入的调研。他们认为，我国多耕地少，农村人均有效耕地不到一亩，如此有限的耕地只能作为农民生存的社会保障，农业剩余很少。在我国当时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月收入800元。2001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年纯收入在4000元以下的农民约为7.3亿，而超过4000元者不足6000万，换句话说，绝大多数农民根本够不到起征线。

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不仅关系到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改善和农村的稳定，也关系到扩大内需方针的落实，更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

局。从2000年起，国家开始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2年扩到20个省，试点地区农民负担平均减轻30%，2003年国家投入305亿元来支持这项改革。但与城镇相比，农村发展迟缓，农民收入尚低。2002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703元，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476元。从1997年到2002年，城镇人均收入实际增长平均每年为8.6%，而农村仅为3.8%。

“停止征收农业税，是一个减轻农民负担的最直接有效、简单易行的好办法。”来自浙江的全国政协委员刘枫也曾直截了当地建议。但当时社会上还有另一种声音：担心农业税的取消会影响国家的“口袋”。对此，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安体富教授估算后提出，农村税费改革大体上已经成熟了，

如果5年内每年减少120亿，完全承担得了。就算农业税的减免，会给依靠农业税税收收入的地区带来较大的财政压力，中央财政完全有能力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手段来消解这种收支压力。

更重要的是，郑祖康认为免征农业税有利于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和加速农业人口非农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有利于土地资源的流转；免征农业税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也有利于拉动内需。

权衡利弊，2003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许坤元、郑祖康委员正式提交了《关于免征农业税的提案》。提案充分分析了当下取消农业税的意义、时机、好处并具体建议：对农民免征农业税。如果考虑到国家财力的困难，可以先免征西部地区的农业税，而后在中、东部实行。

“皇粮国税”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国家邮政局于2006年2月发行的《全面取消农业税》纪念邮票。

提案提出后，财政部随即对提案进行了详细答复，认可了委员们的观点，并详细介绍了解决问题的系列做法以及未来的方

向和举措。2004年初，北京市宣布免征农业税及其附加，实现农业生产环节的“零赋税”，据测算，这一政策可使300多万京郊农民每年受益8000万元。事实上，部分其他省市也陆续在这一阶段试行取消了农业税。

2004年3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从今年起，要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要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五年内取消农业税。”此后的一年，就有25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取消了农业税，使得7.3亿农民人均直接受益数十元至数百元。2005年3月，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宣布：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皇粮国税”将于明年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中央领导在公开场合对取消农业税问题作出的庄严承诺，意味着中央政府对

民心民意的回应与兑现。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由此，国家不再针对农业单独征税。一个在我国存在两千多年的古老税种宣告终结。

回顾取消农业税的历程，从较早提交联名提案的许坤元、郑祖康委员，到接续建言的刘枫、王翔委员，再到更多的没有留下姓名一直关心关注为农民减负的各级政协委员们，他们在不同历史时空，共同汇聚成为助推取消农业税的力量之一，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充分体现了政协委员履行参政议政使命的责任感和热情。该提案也于2019年入选新中国成立70年来100件有影响力的重要提案。

（据中国政协文史馆）

炮火中诞生的红色经典

20世纪60年代，以抗美援朝战斗英雄杨育才带领尖刀班深入敌后，出奇制胜，歼灭“白虎团”团部的事迹为素材创作的京剧现代戏《奇袭白虎团》风靡全国，成为永不磨灭的一代经典。让我们一起回顾这部炮火中诞生的红色经典是如何炼成的。



京剧《奇袭白虎团》（剧照）。

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的故事，要从由一群流落东北的京剧艺人组成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京剧团说起。抗美援朝期间，“现代京剧”改革之风已经吹遍全国，志愿军京剧团更是亲身一线经历了抗美援朝的铁血与烈火；如果要寻找一个最能讲述“新时代最可爱的人”的艺术团体，谁能比志愿军京剧团更合适呢？

1956年，周恩来总理在观看志愿军京剧团演出后也说：“你们不久后也要回国了，拿什么向祖国人民汇报呢？要想想这个问题。”很快，志愿军京剧团在当时的战地简报《志愿军一日》中看到了《杨育才带尖刀班深入敌伪军白虎团》的通讯消息，眼前一亮。京剧团立刻找到了战斗英雄杨育才进行采访，打探具体的事件细节。杨育才的生动讲述，促使京剧团李师斌、方荣翔、李桂华三人灵感迸发，他们迅速执笔完成初稿《侦察兵的故事》，并由殷宝忠、方荣翔组织排练和调度，很快就拿出来给志愿军战士演出——这是志愿军京剧团的第一部现代新编京剧。

果然，亲身经历的体验比经典的传统剧目更能激发战士们的观剧和

参与热情，《侦察兵的故事》迅速在志愿军战士中间一炮打响，受到热烈欢迎。演出结束，战士们更是主动留下来讲述自己的战斗经历，提出基于亲身体验的修改意见，补充了大量战斗英雄的事迹和趣闻……待到志愿军京剧团启程回国之际，他们终于有了“向祖国人民汇报”的作品：70分钟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

中国人民志愿军京剧团回国后集体转业，并入了山东省京剧团，也将《奇袭白虎团》带到了山东大地。为迎接1964年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山东省京剧团选中了《奇袭白虎团》。在剧本创作上，专业京剧编剧孙秋潮带领全省的精英编剧，对《奇袭白虎团》的场次结构、节奏缓急都进行了精益求精的完善，并特意丰满了如崔大嫂、阿玛尼等旦角形象。且旦角作为全剧的叙事线索。

《奇袭白虎团》在朝鲜演出时就以激烈精彩的武打场面见长，此次修改创作更是将武打场面和设计发扬光大。很多动作设计上的大胆创新，不仅巧妙运用传统程式和身段，又精心琢磨创造了“新程式”，把军事动作、舞蹈元素融入京剧身段之中，创造了“排除地雷”“匍匐前进”“刺刀格斗”等现代军事生活的新程式，令《奇袭白虎团》成了新编京剧独一无二的武戏主打。

一部成功的京剧，在演唱方面更需要耳动听，适合传唱。在精彩的武戏之外，《奇袭白虎团》不仅贡献了如西皮流水《打败美帝野心狼》、二黄快板《决不让美李匪帮一人逃窜》等脍炙人口的唱段，其中《决不让美李匪帮一人逃窜》更是融合了二黄唱腔稳重的特点和西皮流水的节奏，组合非

常独特；在音乐方面，序幕、尾声以及唱腔的过门、配乐均运用了《国际歌》的乐调；除此之外，还在展现志愿军群体和朝鲜人民时，采用了《志愿军战歌》和朝鲜民歌《桔梗谣》的乐调，音乐元素丰富细致，令人耳目一新。

《奇袭白虎团》的排演难度极大，对男主角的唱腔身段、动作能力，以及对剧团的人员储备、武打动作功底，导演的调度和控场能力等都有极高的要求。与其他红色经典剧目被各地多次复排不同，国内鲜有院团复排全场《奇袭白虎团》，都只是排演选段，就因为该剧的“高难度”。连山东省京剧团也仅仅于1993年、2010年两次复排本剧，一直到今年7月，才又以150人的庞大阵容对这部“看家大戏”进行挑战。

2020年7月31日、8月1日晚，山东省京剧院第三次复排剧团“看家戏”《奇袭白虎团》，首演取得圆满成功。

作为一部不仅记录了历史事件，歌颂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奋发向上、不畏强敌的伟大精神，同时也因为独特的艺术创新而在现代京剧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的“红色经典”，不断复排既是对人民英雄精神永恒的铭记与歌颂，同时也是珍贵的艺术成就和艺术创新得以延续和传承，弘扬文艺瑰宝，保存艺术火种的重要途径。而最重要的是，《奇袭白虎团》是属于人民的艺术作品，它真正来自一线战士的战斗经历，也真正服务于奋斗在社会主义建设一线的人民群众，它是全国各地京剧艺术家们的“集体创作结晶”，也更是全国人民无法磨灭和忘却的民族灵魂宝藏。

（据《光明日报》）

邓颖超和赵清阁的友情

在邓颖超的朋友中，有很多是文艺界知名人士。给新婚的曹禺写信祝贺；病中不忘给谢冰心送去西花厅的芍药花；和袁雪芬一起聊家常……几乎每个朋友都能述出一段感人的故事。最让人感动的是邓颖超同著名作家、国画家赵清阁的友谊。她们相识于1979年春天，此后十几年两人友谊日渐深厚，情同姐妹，飞鸿颇多。每有机会她们还一定见面前长述，一起谈经历，谈生活，谈人生，谈写作。

1982年春天邓颖超到上海，因公务紧张她无法脱身，就让自己的秘书赵伟代她去看赵清阁，还特意叮嘱赵伟要把赵家房间多拍几张照片，她想从中了解赵清阁的生活环境。

境。那年秋天，邓颖超再次来到上海，即把赵清阁接到宾馆长住。第二天，她还派人给赵清阁送去两枝桂花和一束月季，并便笺附言：“希望能点缀你的雅室。”

1989年9月，75岁的赵清阁入院手术，第二天邓颖超就给她送去花篮和蛋糕。月余之后，邓颖超又托人从北京给她带去压花丹桂一枝和一盒磁带录音口信。在录音中，邓颖超说：“你手术的每个关键我都知道。当时恨不能在手术室外面等着你……”正是这种姐妹般的关怀，对独身的赵清阁起到很大的精神治疗作用，她渐渐痊愈，又坚持写作十年，留下了许多史料价值的文章。

（据《天津日报》）

《中国新军队》：第一部中央红军史著作

1936年1月，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首次出版了滕代远撰写的《中国新军队》一书。这是我军第一部面向世界、全面系统介绍中央红军发展历史的专著，集中展现了中国工农红军这一新型人民军队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是红军叙述史上一部弥足珍贵的重要文献。

滕代远是工农红军早期创始人。1928年7月，他同彭德怀一起领导平江起义，创建了威名远扬的工农红军第五军。历任红五军党代表、红四军副党代表兼三十团党代表，红三军团政委，红一方面军副总政委，在坚持井冈山根据地斗争和中央苏区反“围剿”中立下了卓越功勋。

滕代远写作《中国新军队》时，不仅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全面回顾中央红军的发展历程，而且站在迎接民族抗战的时代高度展望未来、激励民众。他在序言中说：读者读了这个小册子后，对于中国红军发展的历史，特别是红军那种艰苦的、果敢的、刚毅的、顽强的斗争精神。

《中国新军队》一书仅有10万余字，全书共分13章，时段从1927年中国共产党发动武装起义创建人民军到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主力进行西征，既有纵向的发展轨迹描述，又有横向的分门别类剖析，涉及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苏区。

由于年代久远，能够留存下来的原版《中国新军队》极其稀有。据专家查证，国内现存仅有两本相对完整的书稿，都作为珍本保管。2008年，解放军出版社在滕代远领导发动平江起义80周年之际，重印出版了《中国新军队》。

（据《学习时报》）

居里夫人吝啬有理

两次获得诺贝尔奖金的居里夫人和比埃尔·居里结婚时，新房里只有两把椅子，正好一人一把。比埃尔·居里觉得两把椅子未免太少，建议多添几把，为的是来了客人好让人家坐一坐。居里夫人却说：“有椅子是好的，可是，客人坐下来就不走了。为了多一点时间搞科学，还是一把不添吧。”几度春秋之后，这对没有给自己的新房增添一把椅子的年轻夫妇，却给世界化学宝库增添了两件闪闪发光的稀世珍宝——钋和镭。

从1933年起，居里夫人的年薪

已增至4万法郎，但她照样“吝啬”。她每次从国外回来，总要带回一些宴会上的菜单，因为这些菜单都是很厚很好的纸片，在背面书写物理、数学算式，方便极了。她一件毛料旅行衣，竟穿了一二十年之久。有人说居里夫人一直到死“总像一个匆忙的贫穷妇人”。有一次，一位美国记者追踪这位著名学者，走到村子里一座渔家房舍门前，向赤足坐在门口石板上的一位妇女打听居里夫人，当她抬起头时，记者大吃一惊：原来她就是居里夫人！

（据《天津日报》）

《申报》与《新闻报》：谁是“中国的《泰晤士报》”

《申报》是“中国的《泰晤士报》”，是学界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

1916年至1918年，《申报》斥重金建成一栋有100多间房屋的五层报馆大楼，内设照相铜锌版部、排字房、浇字房、藏书室、会议室、会客室、大餐厅、浴室、修容室、卧室等，除了楼梯、电梯外，还有直达地下室的运载货物的升降机。1921年，北岩爵士参观《申报》大楼后，发表观感。除对《申报》提供“真确”新闻的价值与功用进行肯定外，更多的是对在华能有《申报》这样现代化的报馆规模和完备的设备表示赞叹。

在北岩爵士之行后的1922年和1923年，《申报》与《新闻报》先后举办了创办50周年、30周年纪念活动。《申报》编辑成册的《最近之五十年（1872-1922）》纪念文集中，没有人在文章中称《申报》是“中国的《泰晤士报》”。而《新闻报》三十周年纪念册中，多处提及《新闻报》为“中国的《泰晤士报》”。

20世纪20年代，《新闻报》“声誉和《申报》不相上下，物质的设备也并驾齐驱”。人们经常会脱口而出“申新两报”或“新申两报”。从发行量来看，1890年之前中国销量最多的报纸为《申报》，1900年之后《新闻报》“销数一直凌驾于《申报》之上”。（据《光明日报》）

上，成为旧中国发行量最广的大型报纸”。从传播内容看，在20世纪20年代初，《新闻报》属于大众化报纸，而《申报》更多以“质报”面目示人。由于《新闻报》广告版面的比例很大，有时新闻倒成了边角余料的点缀，因此人称“广告报”。《申报》则是以政治新闻为主的严肃报纸。史量才主持《申报》22年，他认为“独立之报纸乃人类幸福之所赖”，力图把《申报》办成世界性的报纸。

再看《泰晤士报》200多年的发展历程，基本上以严肃负责的“质报”著称于世。《泰晤士报》也有过探索大众报时期，就是北岩时期。1908年，北岩爵士买下难以为继的《泰晤士报》后，采取了一系列大众化的方针，主张文章写得短一些、有力量一些，其社论也一改往日沉闷保守的风格，变得轻松幽默。这些革新使得《泰晤士报》的销量在一战期间一跃升为31.8万份，创该报创刊以来的最高纪录。虽然北岩时期是《泰晤士报》的第二次巅峰时期，但改造后的《泰晤士报》已沦为大众化报纸，标志着其“质报”时代和严肃负责传统的暂时终结。从这一阶段两张报纸的风格特点讲，北岩似乎也不会将《申报》比作“中国的《泰晤士报》”。（据《光明日报》）